

明代爲中國近代史上限說

——以郭廷以(1904—1975)及 黃仁宇(1918—2000)爲例

李金強

提 要

20世紀以來,在中外學者的倡導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受到重視。而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項重要課題,即爲如何斷限。其中上限最爲史家所關注,先後產生鴉片戰爭說、自強運動說、明末清初說、明代說、宋代說等。其中以鴉片戰爭說最爲史學界所接受,宋代說、自強運動說附議者不多,本文則以明末清初及明代說作爲探討對象。其中明末清初說尤多學者支持,以郭廷以最具影響,而明代說則獨見之於黃仁宇。故本文遂以郭、黃二人之主張爲個案,藉以說明明代與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密切關係。

關鍵詞：鴉片戰爭 明代 明末清初 唐宋變革期
內藤湖南 郭廷以 黃仁宇

中國近代史研究始於民國時期,由羅家倫(1872—1969)、蔣廷黻(1815—1965)、郭廷以(1904—1975)先後起而倡導,及至1949年後,西方以美國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

1991)爲首,亦起而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由是成爲顯學。其中關於中國近代史之上限,衆說紛紜。或謂始於明末清初(16世紀),或謂始於鴉片戰爭,或謂始於自強運動(1860—1894)。此外,尚有日本內藤湖南(1866—1934)提出“唐宋變革期”,倡宋代以降中國已進入近世之論。黃仁宇(1918—2000)則以“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爲一元論”,而有明代說。本文即以郭廷以及黃仁宇二人之論說爲個案,探討明代與中國近代史進程之關係。

一、中國近代史之上限

傳統中國,最重史學,以其可以鑑古知今。尤其世變之時,士子皆起而記史,以貽後世。就清季而論,魏源(1794—1857)、梁廷柌(1796—1861)、夏燮(1800—1875)、王之春(1842—1906)、何秋濤(1824—1862)、王闈運(1833—1916)等相繼而起,撰書記錄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中外關係等重要史事,是爲中國近代史撰著之始^[1]。

及至民國,先有清華大學蔣廷黻、中央大學羅家倫,起而倡導研究中國近代史,主張利用國內外新資料、新方法進行研究;繼有郭廷以上承蔣、羅二氏,並於1955年創設近代史研究所於中研院,中國近代史研究學風由是確立^[2]。而西方學者,先有法國 Henri Cordier 之 *Histori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2* (1901—1902) 三冊出版,隨即由曾服務於海關的美國馬士(H. B. Morse, 1853—1934)出版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10—1918)* 三冊,首開風氣。繼有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於二戰後因應中國興起,提倡研究近代中國,在費氏之“雄才大略”推動下,桃李滿門,促成美國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蓬勃發展^[3]。至於中國大陸,自1949年後,史家以馬列主義及毛澤東

思想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促成相關研究迅速發展，其中尤以胡繩、范文瀾之撰著最具代表性^[4]。

中國近代史，即在上述中外史家的倡導與推動下，逐漸成爲中國史研究中之“顯學”^[5]。而此一斷代史研究的斷限問題，首先成爲學者所關注的課題，此即徐中約(Immanuel C. Y. Hsü)的著名中國近代史教科書——*The Rise of Modern China*，首論“中國近代史始於何時”之所由起，徐氏於書前論述中外史家分別以鴉片戰爭(1839—1842)或明末清初(1600年前後)作爲中國近代史上限之理據。稍後，張玉法提出中國近代史之上限除此二說外，尚有宋元說，與此相近則爲內藤湖南所主張的唐宋變革之宋代說。而段昌國則從近代化着眼，主張1861年英法聯軍之役後，興起的自強運動應爲中國近代史之始^[6]。其中尤以鴉片戰爭、明末清初及宋代三說，最受學界重視，分別論述如次。

其一，鴉片戰爭說。梁啓超於倡導新史學之時，早已明言道(光)咸(豐)之後，思想、學術、政治、外交、經濟、生活無一不變，爲清史之最大變遷時期^[7]。而蔣廷黻之中國近代史史著，均以鴉片戰爭作爲起始^[8]。事實上，1949年前所出版之《中國近代史》，據張海鵬搜羅，共計44種，其中絕大多數作者均以鴉片戰爭作爲中國近代史之起點，此因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轉變之故；其次，張氏又指出1949年建國後，以中國近代史爲題所出之書，不下百餘種，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胡繩、范文瀾等所作11種，亦均以鴉片戰爭爲近代中國的開端^[9]。

其間胡繩於《歷史研究》創刊號(1954)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明確以鴉片戰爭與五四運動(1919)作爲中國近代史的上下限，引發了國內史家對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熱烈討論。然各家仍認同鴉片戰爭爲上限，祇是下限或主推延至1949年^[10]。

而臺灣張玉法亦認爲以1840年作爲中國近代史的開始，較爲符合歷史的真相，因鴉片戰爭導致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

文化的重大而持續的變遷。如在鴉片戰爭的刺激下一度購炮造船,成爲日後自強事業的主流;而南京條約帶來的不平等待遇,鉗制中國達百年之久^[11]。

由此可見,鴉片戰爭作爲中國近代史的上限尤爲史學界所認同。

其二,明末清初及明代說。此說由羅家倫於鼓吹研究中國近代史時所倡論。他認爲中國近代史不必始於鴉片戰爭,如16世紀中西海路交通的發展、耶穌會士東來和西洋文化與商品輸入,均不能不提^[12]。郭廷以即承師說,在《近代中國史》一書中以16世紀西人東航爲開端展開論述^[13]。此後認同此說者漸多,如黃大受即以明清海通、外力入侵爲國史翻開新一頁,作爲中國近代史之始^[14]。李守孔謂其《中國近代史》一書之叙事“始於16世紀葡萄牙人東航”^[15]。李方晨謂鴉片戰爭以來的變局,應追溯至明清交替之時^[16]。此外,尚有清史名家蕭一山(1902—1978)以“民族革命論”,詮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亦謂宜以明末清初作爲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並謂“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民族革命史”。而民族革命始於明清之際鄭成功創設天地會,其以反清爲革命目的,對日後太平天國、孫中山反清革命,以至民國時期之反帝反日都產生了影響^[17]。而更重要的則爲前述徐中約,於羅列近代史始於鴉片戰爭及明末清初說,比較二者優劣,徐氏斷言明末清初乃中西會合之始,爲理解鴉片戰爭後之中國所必須。稍後,另一本繼徐中約而起的著名教科書,乃由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撰寫的中國近現代史——*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史氏亦明言其叙事始起於1600年,如此方能完全認知當前中國問題之由來,故其書即以晚明作爲起始^[18]。

就此而論,張存武同樣重視明末清初這一歷史階段。他從西洋火器仿製、美洲農作物引進及中西貿易等方面,論述1511年葡萄牙控制滿刺加進而挺進中國這一時期,宜將其列爲近代

中國初期(The Initial Period of Modern China),爲明末清初說作了體系的補充^[19]。

而更值得注意者則爲明史專家黃仁宇主張中國近代的基綫應向後推五百年,以明朝作爲中國近代史的起點^[20]。黃氏之說稍後再作詳論。

其三,宋代說。中國近世始於宋代,乃由日本京都大學內藤湖南(1866—1934)首倡其說,繼由其弟子宫崎市定發揚光大,此即著名之“唐宋變革期”論說,或稱“內藤假說”。內藤開宗明義指出“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說乃謂唐代中葉以降,至於宋代期間,相繼出現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的重大變革。此即政治上由中唐之貴族政治,轉爲宋代的君主獨裁;社會上由平民隸屬貴族,轉而直屬國君,而通過科舉考試制度,庶民得以爲官,取代貴族的社會地位;而經濟上由實物經濟轉成貨幣經濟,並且出現交子、會子等紙幣;就學術文藝而言,由唐代注重師法之箋注義疏,轉爲宋代的疑古,以己意解經;文學則由駢體文轉爲重視自由表現的散文,由詩而爲詞,形式更見自由;藝術方面則由金碧輝煌彩色山水壁畫轉爲水墨畫;音樂則由服務貴族的舞樂,轉爲以平民爲主要觀衆的雜劇,顯現庶民特色。綜上可見唐宋之間出現中古與近代的差別,故宋代爲中國近世之始^[21]。而內藤此說,首由丘添生推介至臺灣史學界^[22],此後引起中外史家關注,多所議論^[23]。

上述中國近代史上限的鴉片戰爭說、明代說、宋代說,論之者衆。然其中郭廷以及黃仁宇二人分別爲中國近代史及明史大亨盛名之學者,故尤受學界所重視。二人之論,均與明代相涉,現就二人之主張爲例,藉此說明明代與中國近代史發展之密切關係。

二、郭廷以及其明末清初說

郭廷以爲中國近代史研究開拓者之一,先後任教於清華大

學、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臺灣師範大學等校。於 1955 年受命於臺北南港中研院創設近代史研究所，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該所即在郭氏領導下，建立體制、充實設備、招攬與培訓人才、從事國際交流與合作，進而出版史料、專刊、集刊，形成一股研究近代史之新學風。該所由是成爲中外著稱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並獲“南港學派”的美譽^[24]。

郭氏原籍河南舞陽，早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中央大學前身之東南大學，師承柳詒徵(1880—1965)、羅家倫並結交蔣廷黻，在柳、羅、蔣三人影響下，投身中國近代史研究。初以札記方法編寫史事日誌，作爲研究近代史的準備，並以油印方式出版《近代史大事記》，爲其研究中國近代史撰著之始^[25]。繼而編纂史料，完成中國近代史史料長編之作，此即《近代中國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1941)一書之出版，此書共兩冊，首冊爲早期中西關係，二冊爲鴉片戰爭，奠基了郭氏於中國近代史的學術地位。此後轉入專題研究，先後出版有關臺灣史、中國近代化、太平天國、中外關係、帝俄侵華及東北邊疆史等書、文。羅家倫、蔣廷黻二人生前，曾希望與郭氏合撰一科學的中國近代史，這一夙願最後由郭氏獨力完成，即爲其臨終前完成的《近代中國史綱》一書，交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26]。

與此同時，郭氏於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臺灣師範大學、近代史研究所任教、任職，先後培養出一批傑出之中國近代史學者，如唐德剛(1920—2009)、王聿均、呂實強(1927—2011)、王家儉、李國祁、王爾敏、李恩涵、張玉法、張朋園、陳三井等人，堪稱桃李滿門。爲中國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批生力軍，郭氏於中國近代史研究之貢獻，於此可證^[27]。

就郭氏對於中國近代史斷限之主張，綜觀其著作，並無明確界定。且間或指出近代中國“乃由鴉片戰爭開始”^[28]。或謂中歐關係，可分兩大階段，一爲 16 世紀前，一爲 16 世紀後，後者“尚可劃分爲二，而以中英鴉片戰爭爲界綫，也就是中國近代史

的界綫”^[29]。然而從其所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著述中，卻無一不從 16 世紀明末清初作爲敘事之始^[30]。茲以其相關著述，舉證如次：

其一，《近代中國史》史料長編一書。原來計劃出版 19 卷，其起訖年限乃由 16 世紀明末清初至 19 世紀清末，然結果只出版兩冊。其中首冊即第一卷，全書輯錄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之中外史料，故所記史事乃“始於 16 世紀葡人東航至 19 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專利權之廢止”。郭氏的中國近代史，顯然以 16 世紀明末清初爲其上限^[31]。

其二，《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爲“流水賬”式工具書，合計兩冊。亦於其上冊首列第一階段（1498—1828）的日誌，作爲起始。而 1498 年乃葡萄牙人伽瑪（Vasco da Gamma）繞航好望角，東抵印度之始，此即郭氏所謂該書記事“開始於鴉片戰爭，而於戰前的中西關係，仍擇要編年，以明其由來”^[32]。

其三，《近代中國的變局》一書內刊有五篇關於中國近代化研究的論文。郭氏之中國近代史研究，自 1950 年起，開始借助“近代化”概念闡釋中國近代史的進程，並提出“近代化延誤”此一概念，藉以說明中國近代在西力衝擊下，未能學習先進西方文化，出現文化差距而造成對外失敗。其間關鍵在於雍正禁教及英使馬戛爾尼（Lord MaCactney）建議傳授“先進”西學被拒，遂出現“近代化的延誤”。且中、英兩國貿易齟齬，終於導致鴉片戰爭發生，結果中國失敗，出現其後百年國運逆轉的悲劇^[33]。進而提出其個人對近代化的定義，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個人，爲使其生活方式，精神的與物質的，能適應時代環境，以增進其福利所作的努力與所獲的成果，即爲近代化”。故近代化乃國家、民族，以至個人，需具有適應時代環境之認知與能力。然近代中國之近代化，卻未能成功，郭氏認爲除國人過度自信與自衛，未能融攝西方文化外，西方列強以強權及優越感加之中國，忽略通過文化知識的相通而給予提攜，亦難辭其咎。此即中

國近代化失敗所由致者^[34]。

就此而論,郭氏明確指出若要了解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導致近代中國的失敗此一歷史進程,“其癥結並不全在近百年之內,實遠伏於百年之前,特別是百年前的百年”^[35]。故此郭氏之文,均先行論述 16 世紀之中西關係,包括歐洲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及俄國,分別從海、陸兩路來華,要求貿易,以至發動侵略的史述;次及明末清初以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為首的耶穌會士東來,借西學作為普傳西教之手段,西方科技文化由是入傳中國^[36]。然最終由於歐洲列強的侵略野心,康熙、雍正因禮儀、政爭禁教,導致對外排拒,遂使 18 至 19 世紀先進西學,未能入傳而見中阻,此即中國近代化延誤之由來。

其四,《近代中國史綱》一書,第一章即以世變前的中國與西方為題,重點論述明末清初,葡、西、荷、英四國擾攘海疆,中俄陸上和戰,以至隨耶穌會士東來之西教、西學入傳與中阻,以此為近代中國史之始起^[37]。

由此可見郭氏對於中國近代史上限,雖曾提及始於鴉片戰爭,然為了了解鴉片戰爭後中國歷史的進展,有必要對明末清初之中西關係作出背景探索。故其相關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包括日誌、史料長編、斷代史、專題論文,多以 16 世紀明末清初為其肇始,而明末清初亦無疑為郭氏中國近代史研究之上限。此點從郭氏於 1955 年創設近代史研究所之時,已於該所研究宗旨中明白指出:“以明清之際為背景,重心在於 19 世紀以來之中國歷史,包括外交、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學術思想等方面。”^[38]宜其為中國近代史以明末清初為上限說之代表者。

三、黃仁宇及其明代說

黃仁宇為旅美著名明史專家。其 1982 年出版《萬曆十五年》一書,以知人論世之史筆,論述皇帝、將相、臣民等六人之紀

傳，顯示其關於明史之卓識新見，由是聲名大噪^[39]。此後著作等身，包括宏觀與微觀著作。前者如以大歷史的“長時間，遠距離，寬視界”，觀察中外歷史的結構與特質，尤其對於我國從傳統至現代的歷史社會轉型，提出不少卓見，如以“數目字管理”概念為依據，論述 20 世紀前後中國由農業組織至商業組織的國家社會架構轉型^[40]。後者則為擅寫人物、史事，得見其卓越之敘事史筆。由是成為在華文世界，深受矚目而大享盛名的史家^[41]。

黃仁宇原籍湖南長沙，父震白為清季福建講武堂第一期學生，先後參加辛亥革命福州光復之役及二次革命，為中華民國開國歷史的見證者。黃氏自謂受其父之影響，此為其日後投軍及撰史之由來^[42]。黃氏早年於南開大學研習電機工程，及至抗戰，轉而投筆從戎，至成都入學中央軍校，畢業後成為軍官，參與進攻緬北戰役^[43]。二次大戰結束後，出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團長副官。其後解甲讀書，赴美國進修史學，於密西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名史家余英時及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以《明代的漕運》為題，取得博士學位。繼而獲費正清主持的東亞研究所給予研究費，從事明代財政研究，並出版《十六世紀明代之財政與稅收》一書，遂以研究明代財政而知聞於西方學界，由是獲得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之賞識，邀其參加《中國科技與文明史》計劃，成為合作研究者與撰著者。1982 年出版《萬曆十五年》一書，引起臺北《食貨月刊》創辦人陶希聖之注意，為其出版繁體字本，始受臺灣史學界所重視^[44]。1986 年至臺北，出席由《食貨月刊》社主辦的“明史研討會”，發表《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新認識》一文，借助大歷史的視角，明確提出研究中國近代史需上延至明代，是為明代為中國近代史上限之說^[45]。

據黃氏於回憶錄所言，其早在密西根大學選擇博士論文題目時，已萌生此念。由於其曾參與抗戰、內戰，本擬以國共內戰

(1945—1949)作為博士論文題目,但思考中逐漸發現當代問題均源於前代,遂決定以明代為其研究對象。確認了解現代中國,必須回溯至過去帝制時期。他說:“明朝是最後一個漢族統治的朝代,在體制上應該更能代表中國的特色。”至於清朝的政治歷史,前期則為異族統治,而後期則受西方衝擊而太多“扭曲”及“陰影”,難以為據^[46]。此即黃氏中國近、現代史上限追溯至明代之所由起。

稍後於出版中、英文《萬曆十五年》一書時,黃氏明言該書欲顯示當代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早在鴉片戰爭前 253 年之萬曆十五年(1587)已經存在^[47]。進而指出通過《萬曆十五年》一書的論點,可見“明末和毛澤東統治下的混亂時期有許多共通點……兩個社會都剛好用道德概念來取代法律”^[48]。

而黃氏中國近代史追溯至明代的說法,當以《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及《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兩文最具代表,分別說明如下: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一文,黃氏首先剖析朱明 276 年的王朝結構。就地理而言,乃為亞洲大陸氣候地理的產物。此即由河患、季風造成水旱災及北方遊牧民族南侵,從而形成王朝中央集權政治及倫理支配社會的特質。就歷史而言,則為對唐宋帝國提倡商業擴張性的反動,而成明朝的收斂性——推行重農、輕徭薄賦,強化中央集權的退縮政策。與此同時,提出與明朝年代相若的西歐,適值文藝復興、資本主義形成、宗教改革及科學革命,從而產生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並舉荷蘭與英國兩國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為例,藉以說明。至此西歐則成其為工商業、交通、資訊發達,而具“數目字管理”的先進社會,而明朝中國則相對成為中央集權、農村經濟為主而不具“數目字管理”的守舊落後社會^[49]。

黃氏進而由大歷史觀點,指出“清朝因襲明朝的成分多而溯本歸原的改革少”,故研究中國近代現代的問題“可以追根究

底地追究到明朝去”^[50]，然明清兩朝本質沒有很大的差別，其王朝結構，仍屬黃仁宇所謂“潛水艇夾肉三明治”^[51]的傳統簡單體制。而通過對此一傳統體制的掌握，中國近代史中的各問題遂能迎刃而解。例如道光與耆英籌辦夷務的邏輯，“乃因中國的體制，無法容納西方的另一爐竈”；太平天國的失敗，不僅由於林鳳祥北伐失敗，楊秀清狡詐巫術壞事，“而是在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組織內，‘良心上的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沒有本身存在的價值”；並使曾國藩以此為口實，增強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秩序，完成中興大業；而康有為百日維新沒有出路，如主張發行公債支持改革，因“沒有把自己的脚跟點看清”。故謂了解明史，“可以使我們從基本的技術角度上把問題看穿”^[52]。此即黃氏提出的明史給我們對近代史的新認識，無疑亦為中國近代史的上限建議。

其次《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此文乃由黃氏研究明代財政專書——《十六世紀中國明代之財政與稅收》所衍生。黃氏提出傳統體制乃由明代“洪武型”財政制度所創造的“洪武體制”，這一體制影響至今。而整個設計，即產生“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之狀態。其影響為負作用。而近代中國亦因此一傳統體制，無力或無意轉型成為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式的社會。故回溯前五百年，即可了解“最近中國遭遇困難的淵藪”^[53]。

此一影響近代中國發展的洪武體制，黃氏於文中作出了詳細描述：稅制乃定額低稅（輕徭薄賦）而向全民直接徵抽；土地制度為佃賃與土地分割零星使用；地方政府之官員，有如中央派出之使節，除負責抽稅，維持秩序，“對各村鎮集團敷衍數不盡的各項儀禮”；法律則以儒家道德倫理之節制為依據；刑法乃以尊卑男女長幼次序及五服為裁判標準；教育則以文化一致；考試制度以八股文選官，促成社會向上流動，此乃以非經濟方法獲得經濟上的利益；軍事制度——衛所，乃軍籍與民籍分割，但缺乏經濟支援，而後勤供應不力。從而形成一種獨特的制度：“政治

上中央集權、經濟上因各農村單位而自給自足，文化上全國一致。”^[54]而此一體制，直至近代中外接觸，其缺失遂顯露無遺。

最後尚須一提者，乃黃氏於中央軍校畢業後，出任下級軍官，駐守雲南，獲得實際的觀感，作為其提出上承明史說之確證。據黃氏所云，當其行軍至內陸農村所見之組織制度，“無非‘王氏家祠’和‘李氏宗祠’和‘松柏惟貞’的節婦牌坊，以及過去人物的‘神道碑’。前清中試的秀才、舉人，則在門前和祠堂前懸掛‘舉人及第’和‘文魁’的牌匾”，內陸地區與明代社會情景相去不遠^[55]。難怪黃氏回憶其駐軍雲南時，謂猶如“必須在明朝的生活條件下過活”^[56]。

由此可見，明代社會形態仍然得見於 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內陸，中國近代史研究宜其上溯明代。

四、結 論

20 世紀中國史研究，在中外學者的倡導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由是受到重視，脫穎而出，逐漸成為國史研究中的顯學。而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項重要課題，即為如何斷限。其中尤以上限最為史家所關注。先後產生鴉片戰爭說、自強運動說、明末清初說、明代說、宋代說等。其中以鴉片戰爭說最為史學界所接受，宋代說、自強運動說和議者不多。而本文則以明末清初及明代說作為探討對象。明末清初說尤多學者支持，以郭廷以最具影響，而明代說則獨見之於黃仁宇。故本文遂以郭、黃二人之主張為個案，藉以說明明代與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密切關係。

郭、黃二人均通過中西歷史進行比較，分別指出明末清初及明代同為了解近代中國世變的必須關注的朝代。郭氏指出明末清初因禁教而使西學東傳中阻，中國未能接觸 18 至 19 世紀歐洲工業文明而出現近代化的延誤，最終未能適應西方衝擊而接連失敗。黃氏則將明代與同時期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歷史

進程作出比較，說明近代中國仍存留“潛水艇夾肉三明治”的傳統體制而不具數目字管理的能力。此皆源起於明代洪武體制，故中國近現代史問題皆宜追溯至於明代。

此外值得注意者為宋代說，全漢昇、劉子健早已指出宋代工商業、科技雖然發達，然始終未能突破，發展出有如西方之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社會。宋代的發展只屬傳統內部之新生，為一新傳統時期而難與近代相比擬^[57]。

綜合上述對中國近代史上限說之申論，明末清初及明代說乃基於歷史發展之連續性立論。事實上，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早已注意需要反溯中國傳統歷史與文化，此費正清素所主張者^[58]。明末清初說已為中外史家所接受，明代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之上限，亦將成為不容忽視之重要觀點。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注釋：

- [1] 參郭廷以：《臺灣的近代中國史研究機會（1963.3.24）》，《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6期（2003），頁106—107；又參俞旦初：《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4—7。著作如魏源：《海國圖志》、梁廷柅：《夷氛聞記》、夏燮：《中西紀事》、王之春：《國朝柔遠記》、何秋濤：《朔方備乘》、王闡運：《湘軍志》。
- [2] 民國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勃興，參包遵彭、李定一、吳相湘：《導論》，《中國近代史論叢——史料與史學》（臺北：正中書局，1956），1輯1冊，頁4—24；王爾敏：《郭廷以先生與近代史學風》，《20世紀非主流史學及史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29—34；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的研究》，《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上

冊,頁47—61。

- [3] 西方之中國近代史研究首開風氣,參費正清門生所編之論文集,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ey, Mary C. Wright, eds., “Introductio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1—7; 馬氏之生平及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貢獻,參王憲明:《蔣廷黻發表“中國近代史”學術影響探析——以受新史學及馬士的影響為中心》,《河北學刊》,24卷4期(2004),頁136—138。費正清的生平與學術成就,則參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並參余英時的評析:《費正清與中國》,沈志佳編:《余英時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5卷,頁430—454;又費氏親友、同儕及其門生弟子,對其生平與學術成就之追憶,可參 Paul A. Cohen and Male Goldman compiled, *Fairbank Remember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一書。
- [4] 周朝民等編著:《中國史學四十年(1949—1989)》(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128—129;張海鵬:《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1。
- [5] 張玉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方向》,《歷史演講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頁3—10。相關研究成果可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89)下冊;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曾業英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6] Immanuel C. Y.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7;又參張玉法:《現代中國史的分期問題》,查時傑:《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的斷代與分期問題》,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80),1輯,頁8—10,頁31—35。並參段昌國:《從近代化眼光看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幼獅月刊》,38卷2期(1973)。
- [7]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飲冰室專集》(臺北:中華書局,1978),1冊,頁35;又梁氏起初亦主張中國近世史斷自明清之際,日後再改主

鴉片戰爭為斷,參包遵彭、李定一、吳相湘:《導論》,《中國近代史論叢——史料與史學》,1輯1冊,頁2—4。

- [8]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中國近代史論集》(臺北:大西洋圖書公司,1970),頁227—237;又參前書頁17,蔣氏《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一書即謂:“按鴉片戰爭實在是近代中國外交史的開始。”
- [9] 張海鵬:《中國近代史通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第一卷,頁3—29。
- [10] 胡繩一文重刊於《歷史研究五十年論文選(近代中國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1—12;又參張海鵬:《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頁1—18。胡氏指出分期目的在於尋找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基本線索,並透過階級鬥爭視角,提出中國近代史出現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及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此一線索,從而引起史學界熱烈討論。相關討論可參《中國近代史歷史分期問題討論集》(北京:三聯書店,1957)一書。然自1980年起,國內史學界再次掀起中國近代史線索問題的討論,並由李時岳提出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資產階級革命三個階段的新論。至20世紀80年代末,再由陳旭麓提出將中國近代史下限由1919年延至1949年。
- [11] 張玉法:《現代中國史的分期問題》,《中國現代史論集》,頁9。張氏認為宋、元的工業和貿易發達及明末清初東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均未如鴉片戰爭導致中國產生重大而持續的變遷。
- [12]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1931),重刊於郭廷以《近代中國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41,重刊),上冊。
- [1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例言,頁1。
- [14] 黃大受:《中國近代史》(臺北:大中國圖書有限公司,1953),上冊,頁1。
- [15] 李守孔:《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58),例言。
- [16] 李方晨:《中國近代史新編》(臺北,自刊,1963),頁1。
- [17] 蕭一山:《中國近代史概要》(臺北:三民書局,1964),頁1—11。
- [18] Immanuel C. Y.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pp. 5 - 7;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p. XX. 又參查時傑:《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的斷代與分期問題》,同前,查氏亦主張明末清初說,認為以此為上限有助了解鴉片戰爭後中國歷史

的發展,故較為合適。

- [19] 張存武:《中國初期近代史要義(1511—1839)》,《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頁473—489。
- [20] 黃仁宇:《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頁218。
- [21] 引文見內藤湖南著,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0—18;內藤湖南著,夏應元等譯:《中國史通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上冊,頁323—334;又內藤湖南的生平及史學成就,參前書前言,頁1—4。
- [22] 邱添生:《論唐宋間的歷史演變》,《幼獅月刊》,47卷5期(1978),頁45—50;《論“唐宋變革期”的歷史意義——以政治、社會、經濟之演變為中心》,《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7期(1979),頁83—111。
- [23] 中外學者對於唐宋變革期的議論,參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81輯(2005),頁125—171。
- [24] 呂實強:《辛勤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241—260;王爾敏:《郭廷以先生與中國近代史之學術建樹》,《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頁12—20;又南港學派的學風,可參《“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座談會發言記錄》之李國祁發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4期(1985),頁413—416;又參 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ri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p. 383; 費正清指出郭廷以及其臺灣師範大學門生於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一系列史料集、專刊,均以史事敘述見長而創出研究成績。又郭廷以與費氏及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Martin Wilbur)的交誼與學術合作,可參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頁105—129。
- [25] 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頁173。
- [26] 郭廷以:《小記》,《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上冊,頁7。
- [27] 李金強:《南港學派的創始者——郭廷以的生平志業及其弟子》,《世變中的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187—192。郭氏蜚聲士林之門生,共計46人,尤以近代史研究最為著稱。如唐德剛任教於紐約市立大

學；王聿均、呂實強、王家儉於臺灣師範大學任教；李國祁先於德國波鴻（Bochum）大學東亞學院任教，後於師大主持歷史研究所；王爾敏、李恩涵分別南下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及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任教；張玉法、張朋園、陳三井亦先後於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任教。

- [28] 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1951），《近代中國的變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27。
- [29] 郭廷以：《近代中國世變的由來》（1954），《近代中國的變局》，頁77。
- [30] 郭廷以著作目錄，見張瑞德等：《郭廷以先生著作目錄初稿》，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頁445—456。計專書23種，中英文論文32篇，史料、口述歷史共70種等。
- [31] 郭廷以：《例言》，《近代中國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1冊，頁1—2。
- [32] 郭廷以：《編者說明》，《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上冊，頁1。
- [33] 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1950），《近代中國的變局》，頁3—25。
- [34] 郭廷以：《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1966），《近代中國的變局》，頁93—105。
- [35] 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近代中國的變局》，頁25。
- [36] 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中國近代世變的由來》（1954），《近代中國的變局》，頁4—7、27—30、77—91。
- [3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頁12—34。
- [38]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十年史稿》（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2。
- [39] 黃仁宇撰寫此書之緣由，參黃仁宇：《自序》，《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4—5；林載爵：《黃河繞青山——黃仁宇叙往以明志》，《傳記文學》，78卷3期（2001），頁60。黃氏謂此書乃失敗者的記錄，包括對神宗、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及李贄等六人思想言行，以推陳出新手法論述，由是引起史學界對黃氏史著之注目。又該書原為英文，出版後譯為中、日、德、法四國語言。兩次提名為美國書卷獎歷史類好書。
- [40] 黃仁宇：《卷尾瑣語》，《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

1988),頁283—284;邱澎生:《“數目字管理”是洞見或是限制?——黃仁宇“大歷史觀”下的明清市場與政府》,《臺大歷史學報》,26期(2000),頁251—376。黃氏憑藉其對16世紀明代財政及17世紀末英國資本主義的研究,進行比較,得出此一概念。進而指出自明代以降的中國,為一未能掌握數目字管理的國家,只具一如“潛水艇夾肉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的傳統社會形態,未能發展出如英國之“經濟組織分工合作,法律體系權利義務分割歸併,道德觀念上私人財產不侵犯”三要素兼具而能够在數目字管理的國家。並參邱氏對此一概念的陳述及批判。

- [41] 晏山農:《追思黃仁宇逝世週年》,《中國時報》,2001年1月5日,頁23;趙世瑜:《通古今之變:再讀黃仁宇》,《百家書語》,2001年5月,頁72;又《中國時報》於黃氏逝世後一年,召開“黃仁宇研討會”,藉以紀念其學術貢獻。參邱澎生:《“與大歷史對話”——黃仁宇研討會會議報導》,http://idv.sinica.edu.tw/pengshan/report_on_rayhuang.htm,2011年3月25日摘取;《“與大歷史對話”——黃仁宇研討會摘要記錄》,《傳記文學》,73卷3期(2001),頁71—73。
- [42] 黃仁宇記述其父之生平及所受影響,參黃仁宇:《蔣介石的歷史地位》,《放寬歷史的視界》,頁225—226;《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245—253。李金強:《密謀革命——1911年福建革命黨人及其活動之探析》,《區域研究:清代福建史論》(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黃震白乃於辛亥革命前夕,加入福州黨人彭壽松創立之“軍警特別同盟會”,而非黃仁宇所謂孫中山創設之“同盟會”。黃震白並於福州光復前夕,遊說福建新軍第10鎮20協協統許崇智(1886—1965)倒戈反清,發動于山戰役,擊敗福州駐防八旗,完成福州光復。
- [43] 黃氏參與緬北戰役時,作為前綫觀察員,撰寫12篇作戰通訊,其後結集成書。見黃仁宇:《緬北之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重刊)。
- [44] 黃氏之生平自述,見文庭澍譯:《黃仁宇與李約瑟定交信》,《傳記文學》,78卷3期(2001),頁62—65;黃競存:《我的哥哥黃仁宇》,《中國時報》,2001年1月5日,頁23;又黃氏生平,亦可參其回憶錄《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一書;又參黃仁宇:《費公(正清)誨我,我負責公》,《地北天南叙古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1),頁151—164。
- [45] 黃仁宇:《卷尾瑣語》,頁285—289;該文始刊於《食貨月刊》15卷7、8期

- (1986),重刊於《放寬歷史的視界》,頁63—91。
- [46] 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頁185—186。又黃仁宇之博士論文為“The G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4),黃氏去世後,由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張皓、張升合譯為中文出版。見張皓、張升:《譯後記》,《明代的遭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47] 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頁115。
- [48] 黃仁宇,同上書,頁546。
- [49] 黃仁宇:《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頁64—82。
- [50] 黃仁宇,同上書,頁82。
- [51] 黃仁宇,同上書,頁63。黃氏借美國人常吃的“潛水艇夾肉麵包”形容明朝的社會形態。其意謂此一三明治,上面一塊長麵包如以四書五經為精神團結的文官集團;而下面另一塊長麵包則為成千上萬的農民;而中間的夾肉配料則為簡單的“尊卑男女長幼的法治基礎及科舉制度”作上下聯繫。並謂此一傳統社會形態,以明朝最為顯著。
- [52] 黃仁宇,同上書,頁85—86;又參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頁93—94。黃氏指出近代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基本原因乃“直到本世紀,中國一直近似只有農業的社會,大體上是由官僚來管理,國民黨在政府組織上層創造出現代的外觀,但底子裏全國仍是村落的結合體,管理方式不可能比明朝或清朝更企業化”。
- [53] 黃仁宇:《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放寬歷史的視界》,頁211、218。
- [54] 黃仁宇,同上書,頁215—216。
- [55] 黃仁宇:《蔣介石的歷史地位》,《放寬歷史的視界》,頁245。
- [56] 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頁10。
- [57] 全漢昇:《略論宋代經濟的進步》,《大陸雜誌史學叢書》,2輯2冊,頁39—42,並參劉子健的回應。
- [58] 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頁435。

Ming Dynasty a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Theories of Kuo Ting-yee and Ray Huang

Lee Kam Ke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as given special atten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scholars within and outside China, and gradually became a prominent fiel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ne important topic for the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oncerns periodization. Historians a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determin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period. They have respectively suggested several demarcative points: the Opium War,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the transition period betwee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Song dynasty. The Opium War is the most widely accepted, while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and the Song dynasty have the lowest number of proponents.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advocacy for the transition period betwee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and support for the Ming dynasty theory. The former enjoys considerable support, with Kuo Ting-yee as its most influential proponent; while the latter is only advocated by Ray Huang. These two theories form the content of the present case study o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Opium War, Ming Dynasty,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ong China, Naitō Konan, Kuo Ting-yee, Ray Huang